

# 收入门槛、相对剥夺与老年人幸福感<sup>\*</sup>

白志远 亓寿伟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我国东、中、西部 12 个省份的城镇和农村 3970 名 55 岁以上老年人微观调查数据,首次考察了在城乡分割和区域发展差异背景下老年人群体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绝对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不显著;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仅具有直接效应,而且还通过健康和娱乐等途径产生间接效应;除了城镇地区,相对收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都显著;不同收入阶层老年人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差异,且中西部和农村地区老年人从“不幸福”到“幸福”的收入转折点低于东部和城镇地区。因此,增加收入有利于提高我国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且应当切实提高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老年人的收入保障水平。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 绝对收入 相对收入 老年人幸福

**作者简介:**白志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博士,430073;

亓寿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博士,430073。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7)05-0020-14

## 一、引言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古往今来,幸福似乎总是与人们的富裕程度联系在一起的。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三步走”,到上世纪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本世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收入水平都被视为衡量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然而,收入的增长一定会使人们感到更幸福吗?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大量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对此做出了深入的探讨,结论莫衷一是。对于我国而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乡和地区差距普遍存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背景下,收入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何影响?影响机制是什么?城乡和地区之间有什么差异?这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普遍关心的问题。

<sup>\*</sup> 本文得到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贫困与富裕阶层代际传递路径及对策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C840030)”的资助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收入不平等代际传递:估计偏误、传递机制与干预仿真(项目批准号:71403297)”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基于此,本文利用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解答。主要的考虑在于:一是人口老龄化将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挑战。2016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2亿,占全国总人口比重16.1%;另据国家老龄委预测,到203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4亿。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群体的幸福水平逐渐成为衡量我国国民总体幸福水平的重要指标。二是我国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存在明显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在老年人身上更加突出。全国老龄委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城镇社会养老保障覆盖率是84.7%,月平均退休金是1527元;农村是34.6%,月平均养老金是74元;城镇老年人平均年收入是17892元,农村是4756元。三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整体收入水平不高。由于历史原因,老年群体更是属于低收入阶层,总体收入来源较窄,水平较低。对于低收入国家的低收入老年人群体的研究尚属首次。因此,本文基于东、中、西部12个省份的大样本研究,首次在城乡分割和区域发展差异背景下,细致考察了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收入与其幸福感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老年人幸福感的正确认识,创新养老模式,更好地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老年人作为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主体人群,对于国家的公共服务政策和财政转移支出更为敏感,相关结论对于制定和评价公共政策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 二、文献综述

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历来是研究者们感兴趣的课题,经济学家们提出许多理论模型来解释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从绝对收入来看,根据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论,高收入者更容易实现生理和安全的需要,物质财富、机遇和选择也更多;从相对收入来看,人们对幸福的感觉是通过与周围人的比较得出的,幸福感的高低与人们选择的对象息息相关,有向上比较和向下比较两种类型。此外,Rojas(2007)认为,人们对幸福的感觉往往取决于他所认为的幸福的概念是什么,即个体对幸福的概念所指,将收入看得比较重要的人,收入提高就能增加他的幸福感,反之则反;幸福的概念指向有两种类型,即内部指向和外部指向。内部指向强调精神世界的作用,更多关注内心的动机和态度;外部指向则更多关注享乐、物质等外部条件。

由于幸福、效用不可度量,对于收入与幸福感的学术研究多停留在规范领域之中。这一现象被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主观幸福感与收入之间的经验研究所打破。Easterlin(1974)首次论述了美国跨时期人均绝对收入变化与幸福变化的关系,结果出人意料表明,收入随着时间增长的同时幸福感并没有同比例增加。后续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研究大都支持这一结论(Blanchflower和Oswald,2004),但是基于同一时点横截面的跨国研究表明,富裕国家的人比贫穷国家的人更幸福,即幸福感与绝对收入存在正向关系(Easterlin,1995等)。另外一些研究也表明,绝对收入对幸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收入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如收入水平较低的拉丁美洲国家,平均收入与平均幸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Graham和Pettinato,2006;Easterlin,2005;Graham和Felton,2006;Betsey和Justin,2013);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绝对收入水平与平均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较弱(Shields和Price,2005)。从这些研究中得到的推论是:从人均绝对收入来看,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或者说存在一个收入的门槛,在该收入水平以下,收入增长对幸福感的作用强,而超过这一水平作用减弱。如Frey和Stutzer(2002a)以及McMahon(2006)利用美国的数据研究证实,当人们的年收入超过一万美元时,收入的增加对幸福感的影响

几乎可以忽略。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者开始关注相对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相对收入才是决定个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原因,人们常常在跟别人的对比之中由于具有相对优越的地位而感到幸福。然而,这类研究的困难在于选取什么样的人群作为参照对象才是合理的。Clark 和 Oswald(1996)认为参照组应当是收入水平与自身相近的人群,并实证检验了效用与参照组收入水平相关。他们的结论是绝对收入对幸福几乎不产生任何效应,而相对收入却起着重要作用,并且所比较的人群收入水平越低,人们的满意度就越高。但是,也有研究表明相对收入只是起到补充作用(Frey 和 Stutzer, 2002a; Senik, 2004; Gokdemir 和 Dumludag, 2012)。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从收入阶层的角度对主观幸福感进行考察提供了另外一种新的思路。这种方法放松了对收入和主观幸福感先验的线性假设,通过将收入分布按照一定的方法划分为不同的收入阶层,进而考察收入阶层差异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变化(Frijters 等, 2004; Lelkes, 2006; Emmanouil 和 Moro, 2009)。Clark 等(2005)采用收入分层的方法探讨了收入与幸福之间斜率的变化,结果发现,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收入阶层表现出显著不同的边际效应。

现阶段,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关于主观幸福感的讨论。朱建芳、杨晓兰(2009)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考察了 1990—2006 年转型时期我国居民幸福感的状况及其变化。结果显示,1995 年、2001 年和 2006 年收入与幸福感呈正向关系,而 1990 年则呈负向关系。官皓(2010)分析了京、沪、粤的数据后得到绝对收入对幸福感影响不显著的结论,谢识予等(2010)也在控制性别、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等因素后认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刘军强等(2012)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发现近 10 年来居民幸福感逐渐上升,经济增长是主要原因。任海燕、傅红春(2012)利用 2006 年 CGSS 数据发现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负影响而对农村居民则不显著。殷金朋等(2016)利用 2013 年 CGSS 数据研究了社会保障支出及其地区差异对幸福感的影响,发现社会保障水平与居民幸福感存在 U 型关系。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老年人的幸福感问题逐渐受到全社会的关注。陈彤(2009)对西部地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调查,发现高收入老年人比低收入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强,认为传统的“养儿防老”思想正在转变为“存钱养老”。任杰等(2010)采用元分析技术对 21 篇有关老年人幸福感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后,认为文化程度与收入在低文化水平和收入稳定的老年群体中对幸福感有中等程度的预测力。于天琪(2011)设计了老年人幸福感量表,并以此量表数据分析得到职业、经济收入与幸福感具有显著相关性,即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并且具有预测作用。胡洪曙、鲁元平(2012)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发现收入不平等不仅直接影响、还间接地通过影响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来影响主观幸福感,并且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胡宏伟等(2013)发现收入高低会显著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是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上述针对收入在老年人群中幸福感的影响的文献,大致上都认为收入是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之一,但上述文献在区分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收入阶层上有所欠缺,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虽有收入对一定区域的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但仍缺乏区域之间对比的探讨。

本文基于上述研究已取得的进展,提出以下假设:一是绝对收入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关系,但存在一定的门槛,收入较高地区可能出现负向作用。二是在老年人收入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相对收入与老年人幸福感呈负向关系。三是收入的影响作用不仅具有直接效应,还可能通过其他机制具有间接效应。通过分析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的大规模抽样数据,在我国城乡

分割和区域差异的背景下,重点在于依据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收入阶层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综合考察三种收入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 三、方法与数据

#### (一)研究方法

在经济学中,如何度量幸福和效用一直是个难题。近年来,随着心理学对幸福感研究的发展,“可衡量的效用”渐渐为经济学家所接受。根据 Diener 等(1999)的定义,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是人们对其生活质量做出的情感性和认知性评价,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没有客观标准。心理学家经常采用自陈量表法来测量主观幸福感,即通过被调查者回答有关幸福方面的问题获得对幸福的主观感受。本文的调查问卷借鉴心理学的方法,让被调查者对“目前生活状况”进行5分等级评价,评分等级越高,幸福感就越高。那么仅通过被访者回答该问题是否能够有效地测量其主观幸福感?结果是否可信呢? Dolan, Peasgood 和 White(2007)研究表明,采用问卷形式的调查能够反映人们真实的主观幸福感;此外, Easterlin(2001)的研究也证实通过提问的方法来测量主观幸福感具有研究价值。

由于调查所得的幸福感数据为有序离散变量,使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进行分析,假设幸福感为收入等因素的线性函数,计量方程为:

$$y_i^* = \sum_{k=1}^K \beta_k x_{ki} + \epsilon_i, \epsilon_i \sim NID(0, 1) \quad (1)$$

$$y_i = j \text{ 若 } \xi_{j-1} < y_i^* \leq \xi_j, j = 1, \dots, 5 \quad (2)$$

其中,  $y_i^*$  为主观幸福感,通过门槛参数  $\xi_j$  与调查得到的离散幸福感变量  $y_i$  相对应,  $y_i$  为1到5的离散变量,分别表示老年人的幸福感为“很差”“差”“一般”“好”和“很好”5分等级评价;向量  $x_{ki}$  表示  $k(k=1, \dots, K)$  个解释变量,包括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其他影响幸福感的个人特质和社会环境等因素(Frey 和 Stutzer, 2002b),  $\beta_k$  为第  $k$  个影响因素的系数;  $i$  表示为被调查的个体( $i=1, \dots, N$ );  $\epsilon_i$  为扰动项。根据式(1)和式(2),得到 Ordered Probit 模型的条件概率为:

$$\Pr(y_i = j | x_k) = \phi(\xi_j - \sum_{k=1}^K \beta_k x_{ki}) - \phi(\xi_{j-1} - \sum_{k=1}^K \beta_k x_{ki}) \quad (3)$$

其中,  $\xi_0 = -\infty, \xi_5 = \infty$ , 且  $\phi(\xi_0) = 0, \phi(\xi_5) = 1, \phi$  为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系数  $\beta_k$  和门槛参数  $\xi_j$  进行估计。通过利用式(3)考察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城乡和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由于 Ordered Probit 模型的特点,我们虽然可以得到系数  $\beta_k$ ,但这只是表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不能直接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大小。因此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对老年人群的收入进行分层处理,估计不同收入阶层情况下的边际效应,进一步考察不同收入阶层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由于收入阶层均为二元变量,此时 Ordered Probit 模型的边际效应为:

$$\frac{\Delta \Pr(y_i = j | \bar{x}_i)}{\Delta z_k} = \Pr(y_i = j | \bar{x}_i, z_k = 1) - \Pr(y_i = j | \bar{x}_i, z_k = 0) \quad (4)$$

其中老年人的收入阶层变量( $z_k$ )从0变为1,即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属于这一收入阶层,而不属

于其他收入阶层时,老年人幸福感评价为  $j$  的预测概率(Predicted Probability)。

(二)数据来源、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1 年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中的成人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中国营养与食品安全研究所联合建立。CHNS 采用多层次随机抽样方法,样本覆盖了我国东、中、西部 12 个省份(上海、北京、重庆、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和贵州)的城镇和农村居民,提供了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幸福感调查样本,并且包括了被调查者的经济特征和一系列社会人口特征:收入水平和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婚姻、医疗保险状况等。本文以此数据考察我国老年人幸福感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去掉缺失值,样本共 3970 人。CHNS 问卷中关于主观幸福感的问题是“你认为你现在的的生活怎样?”,数字 1 到 5 代表五个等级评价,从“很差”到“很好”。

图 1 为城乡和东、中、西部地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分布。整体上主观幸福感的分布较为对称,略向右偏。城镇幸福感评价“很好”和“好”的比重为 58.79%,高于农村的 55.62%,幸福老年人的城乡比重差异不大;东部地区为 63.8%,中部 60.35%,西部 41.34%,由东部到西部地区,幸福老年人的比重存在明显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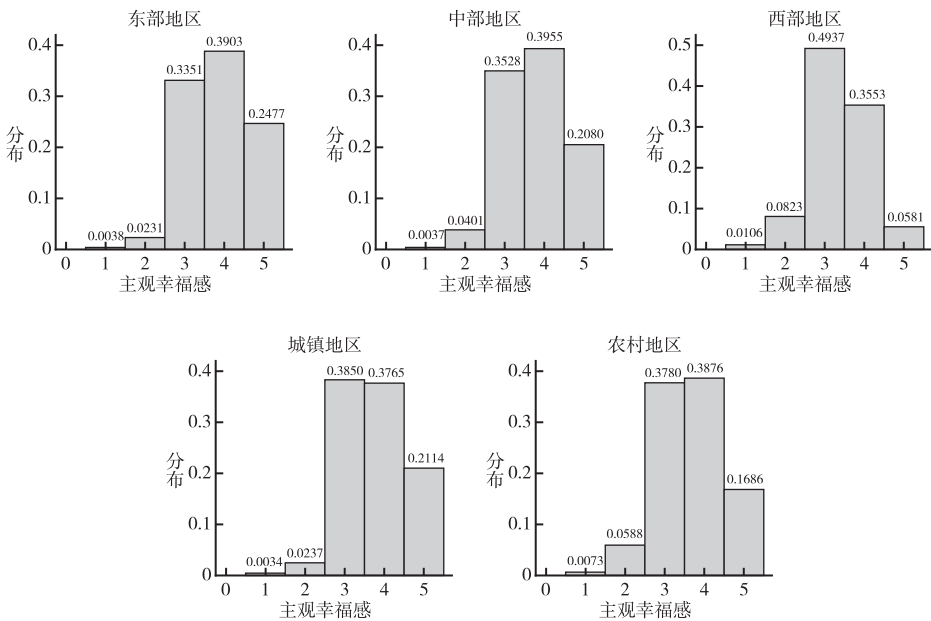


图 1 城乡和东、中、西部地区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表 1 为自变量的定义及相关描述性统计。从相对收入来看,被调查者家庭收入低于社区平均收入的居多;总体来看,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比较健康;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义务教育阶段偏多,符合老年人所处的时代特征;从对幸福的概念所指来看,老年人对内在在精神世界的评价要高于对收入的评价;被调查者基本上都参加了医疗保险,娱乐活动频繁;从地区分布来看,城乡分布均匀,东部地区偏多。

表 1 自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定义	变量描述	均值	标准差
收入水平	绝对收入	城镇老年人收入主要来自退休金和部分工资(尚未退休或者退休返聘),农村老年人收入主要来自农、林、菜、渔、畜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以及各种补贴。绝对收入为收入的对数值。	9.455	1.098
	相对收入	假设 $Y$ 为被调查者家庭收入, $Y_a$ 为所在社区平均家庭收入,则家庭相对收入为: $\ln Y - \ln Y_a$ 。城镇的社区为被调查者所居住的社区,农村为被调查者所居住的村。	-0.270	0.886
健康状况	身体健康	询问被调查者最近一个月是否患有慢性或急性疾病,若无则表示身体健康,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0.763	0.425
	心理健康	询问被调查者精力是否和 2010 年一样充沛,是否与年轻时一样快乐,事情是否比想象中的要好等问题,若是,则代表心理健康,取值为 1,否则为 0。	0.583	0.493
受教育情况	文盲	不认识汉字,也不会进行简单的数学计算。	0.309	0.462
	小学及初中	正规学校教育 $\leq 9$ 年。	0.455	0.498
	高中及以上	正规学校教育 $> 9$ 年。	0.237	0.425
幸福概念所指	内部指向	若“自己坚持体育锻炼、健康饮食”“孩子坚持体育锻炼、健康饮食”在被调查者生活中很重要,则取 1,否则取 0。	0.371	0.483
	外部指向	若“自己有好的收入”在被调查者生活中很重要则取 1,否则取 0。	0.364	0.481
人口社会学特征变量	性别	男性=1,女性=0。	0.516	0.500
	婚姻	已婚取 1,其他情况(未婚、离婚、丧偶、分居)取 0。	0.852	0.355
	工作状况	有工作=1,无工作=0。	0.405	0.491
	医疗保险状况	有=1,无=0。	0.976	0.153
	娱乐活动	如果被调查者日常生活中经常看电视、书报,听收音机,则为 1,否则为 0。	0.948	0.222
	户籍	城镇=1,农村=0。	0.446	0.497
	东部地区	包括山东、辽宁、江苏、北京和上海。	0.470	0.499
	中部地区	包括黑龙江、河南、湖南和湖北。	0.270	0.444
	西部地区	包括重庆、广西和贵州。	0.260	0.439

#### 四、实证分析

(一)城乡与地区差异下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y_i = \alpha x_i + \beta z_i + \varepsilon_i \tag{5}$$

其中,  $y$  为主观幸福感;  $x$  是收入向量,包含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两个变量;  $z$  为个体特征向量,

包括健康状况、医疗保险状况、性别、婚姻、教育和娱乐状况等。采用 Stata 13.0 统计软件对式(5)进行估计。本文采用 Ordered Probit 模型以解决被解释变量的序数离散性问题。由于样本来自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所以同一“群体”中的样本不是完全独立的,这虽然不会对点估计造成影响,但会导致估计结果的标准误差偏小。本文中,同一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卫生状况、医疗条件等十分相似,而这些因素都会对幸福感起作用,致使同一社区老年人的幸福感的扰动项不独立(亓寿伟、周少甫, 2010)。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进行了聚类(Cluster)校正。同时,也对总体样本进行了 OLS 估计。限于篇幅,本文只列举了加入全部自变量的回归结果。稳健回归的结果分别见表 2 和表 3。

表 2 收入对老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变量	Ordered Probit						OLS
	(1)	(2)	(3)	(4)	(5)	(6)	(7)
绝对收入	0.189*** (0.0158)	0.143*** (0.0171)	0.141*** (0.0172)	0.130*** (0.0174)	0.129*** (0.0174)	0.230*** (0.0367)	0.166*** (0.0265)
相对收入						-0.133*** (0.0428)	-0.0956*** (0.0309)
性别		-0.0436 (0.0368)	-0.0448 (0.0368)	-0.0466 (0.0371)	-0.0446 (0.0371)	-0.0334 (0.0373)	-0.0235 (0.0269)
医保状况		0.212* (0.113)	0.207* (0.113)	0.232** (0.114)	0.246** (0.114)	0.246** (0.114)	0.177** (0.0824)
婚姻状况		0.133*** (0.0500)	0.125** (0.0501)	0.0940* (0.0504)	0.0847* (0.0505)	0.0816 (0.0505)	0.0574 (0.0365)
小学及初中		0.106** (0.0424)	0.0973** (0.0425)	0.0483 (0.0429)	0.0407 (0.0430)	0.0199 (0.0435)	0.0142 (0.0315)
高中及以上		0.302*** (0.0532)	0.294*** (0.0532)	0.253*** (0.0536)	0.231*** (0.0540)	0.188*** (0.0558)	0.134*** (0.0402)
工作状况		-0.152*** (0.0371)	-0.151*** (0.0371)	-0.175*** (0.0376)	-0.158*** (0.0377)	-0.124*** (0.0392)	-0.0900*** (0.0283)
娱乐状况			0.245*** (0.0792)	0.197** (0.0800)	0.203** (0.0802)	0.200** (0.0802)	0.144** (0.0581)
身体状况				0.536*** (0.0364)	0.526*** (0.0365)	0.517*** (0.0366)	0.372*** (0.0260)
心理状况				0.214*** (0.0415)	0.219*** (0.0415)	0.224*** (0.0416)	0.161*** (0.0300)
内部指向					0.181*** (0.0415)	0.172*** (0.0416)	0.125*** (0.0299)
外部指向					-0.189*** (0.0412)	-0.188*** (0.0412)	-0.136*** (0.0296)
_cons							1.427*** (0.272)
样本数	3933	3933	3933	3929	3929	3929	3929

注:(1)\*、\*\*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上显著。(2)\_cons 为 OLS 回归常数项,限于篇幅,本文省略 Ordered Probit 回归的门槛参数结果。

表 3 城乡、各地区异质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幸福感	(1)城镇	(2)农村	(3)东部地区	(4)中部地区	(5)西部地区
绝对收入	0.290*** (0.0674)	0.271*** (0.0470)	-0.0483 (0.0715)	0.340*** (0.0618)	0.264*** (0.0844)
相对收入	-0.0792 (0.0808)	-0.206*** (0.0528)	0.236*** (0.0791)	-0.226*** (0.0724)	-0.200** (0.0934)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1763	2166	1858	1054	1017

注：\*、\*\*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 1. 绝对收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表2的(1)~(6)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对收入与老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模型(1)仅考察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其余依次加入人口社会学特征、从事娱乐活动状况、身心健康及对幸福的概念指向等变量;模型(6)在绝对收入和所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相对收入变量;模型(7)为 OLS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绝对收入对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绝对收入的作用有所下降,但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3显示,无论对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绝对收入均有显著正影响。再次,从东、中、西部地区角度来看,绝对收入对东部地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老年人的影响显著,这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1)从短期来看,收入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目前我国总体收入水平还不高,尤其是老年人对收入更加敏感,城镇老年人基本依靠退休金和养老金,而农村老年人在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基本上依靠自己的农业劳作和子女的接济,收入来源比较单一,财产性收入占比较小,并且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退休金在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中占比都是最大的;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城镇老年人主要依靠退休金,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菜园收入,<sup>①</sup>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即某种程度上来说“金钱可以购买幸福”。(2)从长期来看,当老年居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变得不显著,即现阶段在我国老年群体中“收入—幸福”悖论同样存在。这可能是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问题、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等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步大大降低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当收入跨过某一水平后,这些非收入因素超过了收入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人们更加关注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 2. 相对收入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由表2中的模型(6)和(7)可以得出,相对收入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影响,在控制了绝对收入后,相对收入的影响依然显著,这与 Clark 和 Oswald(1996)、Blanchflower 和 Oswald(2004)的研究结果一致,即相对收入与居民幸福感呈负相关。原因在于“相对剥夺效应”占主导地位,即人们在参照群体相比较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被其他群体剥夺的负面心理体验,进而产生消极感受。从表3的城乡样本来看,相对收入对城镇居民影响不显著,对农村居民有显著负影响。这与何立新、潘春阳(2011)的研究结论相似,即相对收入对低、中收入阶层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对中高收入阶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但系数为负。从地区来看,相对收

① 限于篇幅,城乡及各地区老年人收入来源所占比重情况省略。



人对东部地区有显著正影响,对中西部地区有显著负影响。对于东部地区老年人来说,退休金在收入来源中占比最大,收入水平的高低更多地取决于退休前的职业和职称,相对收入越高越能激发一种相对优越感。对于中西部地区老年人来说,相对收入的提高一方面是自己辛苦劳作的结果,一方面是子女更多的接济,这两种方式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从而降低了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

### 3. 健康等其他变量与主观幸福感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身体健康比心理健康更为重要,可见,对于老年人来讲,身心健康是影响其生活幸福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教育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并且教育水平越高,影响作用越显著;医疗保险和娱乐活动均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拥有工作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显著负向作用,这可能是由于老年人年纪较大,从事工作会占用闲暇时间并且上下班路途等交通状况也会降低老年人的幸福感。值得注意的是,对幸福概念指向的两种类型,即内部指向和外部指向,对幸福感的作用,内部指向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外部指向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收入来源和水平都比较狭窄,属于低收入群体。因此,将内部精神世界看得越重要的人群,越容易感到幸福;而将外部物质条件看得越重要的人群,幸福感就越低。

#### (二)收入影响幸福感的进一步探讨

正如理论基础中提到的,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归结个体身体健康状况的改善、拥有更多闲暇时间从事娱乐活动而不为生活所累、物质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等方面。本文进一步地通过引入收入与娱乐活动、身体状况和外部指向这三个指标的交互项来探讨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sup>①</sup>表4中模型(1)显示,在控制了收入和娱乐活动的交互项后,收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娱乐活动越频繁,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就越强,并且结果在实证意义上显著,这与鲁元平(2014)的研究结果相似,即老年人收入越高就越有时间和精力进行社会交往,从事闲暇娱乐从而幸福感越高。模型(2)显示,在控制了收入与健康的交互项后,收入的影响已不再显著,而交互项显著为正,即收入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升身体健康状况来实现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年轻一代外出数量增多,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只能与配偶生活在一起,健康的身体对于老年居民来说十分重要,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极为方便,而且减轻了子女的负担。收入水平的提升不仅可以改善老年人的饮食卫生状况,而且可以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模型(3)显示,在收入水平一定的前提下,认为收入很重要的老年人越不容易感到幸福。模型(4)控制了全部交互项后,收入的影响依然显著,说明收入不仅可以间接地通过改善老年人健康状况来提升幸福感,而且还具有直接效应。从城乡来看,对于城镇居民收入主要是通过影响娱乐活动来影响幸福感,而农村更多地表现为收入的直接效应。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收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参与娱乐活动所产生的间接效应,中部地区既有直接效应又通过影响健康状况产生间接效应,而西部地区更多地是间接地通过健康来影响的。

#### (三)城乡和东、中、西部地区差异下收入阶层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前面的研究显示,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和城乡之间,绝对收入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发生一个从不显著到显著的跨越,那么其相应的转折点是多少呢?不同的收入阶层,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作用机制有何不同?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采用收入分层方法展开研究。参照

<sup>①</sup> 限于篇幅,回归结果只显示交互项显著的回归模型。

Emmanouil 和 Moro(2009)的方法将所有老年人的收入数据划分了7个等级,<sup>①</sup>从最低到最高分别为a1~a7。基于 Ordered Probit 回归结果,表5给出了城乡和东、中、西部地区不同收入阶层老年人幸福感的边际效应,具体数值的含义是当某个老年人属于某个收入阶层时,与基础阶层 a4 (13200~19200元)相比,报告相应幸福感等级的概率变化,正号表示概率增加,负号表示概率减少。将收入划分为不同的收入阶层,不仅可以考察不同收入阶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和地区差异,而且通过收入分组的方式放宽了收入和幸福的线性关系假设,使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在收入分层的情况下表现得更为稳健。同时,将幸福感分为“不幸福”(SWB,J=1、2、3)和“幸福”(SWB,J=4、5)两个类别,使分析更直观。

表4 收入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进一步探讨

被解释变量:幸福感	(1) 全部样本	(2) 全部样本	(3) 全部样本	(4) 全部样本	(5) 城镇	(6) 农村	(7) 东部地区	(8) 中部地区	(9) 西部地区
绝对收入	0.111*** (0.0195)	0.107 (0.1390)	0.136*** (0.0175)	0.140*** (0.0379)	0.081 (0.0492)	0.269*** (0.0703)	0.086 (0.0675)	0.132* (0.0716)	0.108 (0.0696)
绝对收入×娱乐活动	0.020** (0.0087)			-0.059 (0.0382)	0.024** (0.0111)	0.0179 (0.0145)	0.033** (0.0159)	0.0162 (0.0135)	0.024 (0.0171)
绝对收入×身体状况		0.022*** (0.0043)		0.020** (0.0088)	-0.111 (0.0708)	-0.008 (0.0504)	0.449*** (0.0555)	0.558*** (0.0699)	0.507*** (0.0725)
绝对收入×外部指向			-0.019*** (0.0043)	0.050 (0.0335)	0.075 (0.0661)	0.032 (0.0421)	0.090 (0.0613)	0.048 (0.0599)	0.038 (0.0616)
其他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数	3929	3929	3929	3929	1763	2166	1858	1054	1017

注:\*、\*\*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1. 从整体趋势上,低收入阶层(a4收入水平以下)老年人感觉生活不幸福,高收入阶层(a4收入水平以上)老年人感觉幸福,表明在目前我国老年人群中,“收入可以购买幸福”(Emmanouil 和 Mirko,2009)。同时,低收入老年人和基础收入阶层(a4)相比,感觉到生活“不幸福”概率更高(城镇高达14%,农村也有9%),但农村感觉到生活“不幸福”老年人群的收入阶层范围大于城镇(城镇为a1和a2阶层,年收入低于6402元;农村为a1-a3阶层,年收入低于13200元)。可能的解释是:(1)城镇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对较为完善,能够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只有收入极低(年收入低于6402元)时,才倾向于感觉到生活“不幸福”。而对农村老年人来讲,年收入13200元要负担生活中的所有开支,对于健康状况日益下降的老年人群来讲,显然是不够的。(2)城镇老年人的收入主要依靠退休金,而农村老年人的收入主要依靠子女和自己的菜园收入,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因此与基础收入阶层相比,农村更倾向于感觉生活“不幸福”的人群比例达到了56%,而城镇仅为7%。城镇老年人感觉生活“不幸福”到“幸福”的收入转折点发生在a3阶层(6402~13200元),而农村老年人的收入转折点发生在a5阶层(19200~27302元),表明农村老年人自身需要担负更多的生活或健康支出,从而影响了幸福感。

<sup>①</sup> 整个收入分布每20个百分点分为一个等级,由于最低20%分位点和最高20%分位点的收入变化较大,进一步将其分别分为两个小组,每10个百分点为一组,最后得到a1~a7总共7个收入等级。

表 5

城乡和各地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

收入阶层	城镇地区					农村地区				
	J=1	J=2	J=3	J=4	J=5	J=1	J=2	J=3	J=4	J=5
a1(2891元以下)	0.006	0.028**	0.125***	-0.066**	-0.093***	0.008***	0.042***	0.09***	-0.061***	-0.075***
a2(2891~6402元)	0.008*	0.033**	0.140***	-0.078***	-0.103***	0.006**	0.031***	0.069***	-0.045***	-0.061***
a3(6402~13200元)	-0.001	-0.004	-0.030	0.009	0.026	0.001	0.009	0.023	-0.012	-0.021
a5(19200~27302元)	-0.005**	-0.023***	-0.108***	0.054***	0.082***	-0.002	-0.012	-0.039	0.0148	0.037
a6(27302~36000元)	-0.001*	-0.008**	-0.065**	0.015**	0.059**	-0.002*	-0.016**	-0.055*	0.019**	0.054*
a7(36000元及以上)	-0.002**	-0.012***	-0.111***	0.018**	0.107***	-0.004***	-0.030***	-0.123***	0.024***	0.133***
收入阶层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J=1	J=2	J=3	J=4	J=5	J=1	J=2	J=3	J=4	J=5
a1(2891元以下)	0.001	0.006	0.034	-0.009	-0.032	0.008**	0.051***	0.153***	-0.082***	-0.130***
a2(2891~6402元)	0.002	0.009	0.047	-0.014	-0.044	0.005*	0.037***	0.125***	-0.059***	-0.109***
a3(6402~13200元)	-0.001	-0.003	-0.016	0.004	0.015	0.002	0.017**	0.069**	-0.024**	-0.064**
a5(19200~27302元)	-0.001	-0.001	-0.008	0.002	0.008	-0.001	-0.009	-0.050	0.006	0.053
a6(27302~36000元)	-0.001	-0.004	-0.027	0.005	0.028	-0.001	-0.012*	-0.073*	0.005	0.081*
a7(36000元及以上)	-0.002*	-0.009**	-0.062**	0.006	0.066**	-0.002*	-0.019***	-0.135***	-0.011	0.166***
收入阶层	西部地区									
	J=1	J=2	J=3	J=4	J=5					
a1(2891元以下)	0.008*	0.038**	0.053**	-0.073**	-0.024**					
a2(2891~6402元)	0.005	0.024	0.038	-0.049	-0.018					
a3(6402~13200元)	0.007**	0.034**	0.049**	-0.067**	-0.023**					
a5(19200~27302元)	-0.003	-0.015	-0.034	0.035	0.017					
a6(27302~36000元)	-0.005*	-0.030**	-0.080*	0.073**	0.042*					
a7(36000元及以上)	-0.007**	-0.051***	-0.180***	0.127***	0.111**					

注：(1)\*、\*\*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2)以中间收入阶层a4为基础阶层建立虚拟变量；(3)本表给出的是各收入阶层对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变量取0到1之间的变化。

2. 东、中、西部地区各收入阶层老年人对生活的幸福感知与城乡的情形表现出了相对的一致性,只是参数显著程度上普遍降低。东部作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与基础阶层相比,感觉生活“不幸福”概率更高的收入阶层仅出现在 a1 和 a2 阶层,中西部地区老年人群均扩大到了 a3 阶层。东部地区老年人与基础阶层相比更倾向于感觉生活“幸福”的收入阶层为 a7(年收入 36000 元以上),中西部为 a6(年收入 27302 元以上)。这说明从东部到西部地区,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同。最为发达地区,东部老年人平均收入较高,收入的影响力已经开始被许多非收入因素所替代。因此,对于同样的幸福感水平,东部地区老年人需要获得更多的收入才能够达到,而对于中西部地区较低的收入即可获得。

##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我国东、中、西部 12 个省份的城镇和农村 3970 名 55 岁以上老年人抽样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1)现阶段,绝对收入水平是影响我国老年群体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不仅具有直接效应而且间接地通过影响健康状况来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2)在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相对收入效应抑或攀比效应的影响较小且是负向作用;而在高收入水平阶段,相对收入的正向作用超过了绝对收入的负向作用。(3)不同的收入阶层绝对收入水平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不同的影响,收入水平越低的人越容易感到不幸福,而收入水平越高的人就越容易感到幸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农村老年人从“不幸福”到“幸福”发生转折时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城镇,但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老年人从“不幸福”到“幸福”发生转折时的收入水平却低于东部地区。一方面说明我国城乡收入水平差距依然存在,农村的社会保障状况远远落后于城镇,因此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更强;另一方面说明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城乡之间差距微弱,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超过了绝对收入的影响,人们更多地关注收入之外的因素。(4)在我国,收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显著但差距不是很大。地区幸福感差异的结论与 Easterlin 悖论(何立新、潘春阳,2011)中提出的跨国或跨地区的观点一致,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存在正相关。

从研究中得到的启示:(1)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绝对收入水平是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并且有保障的、稳定的收入来源更为重要。对老年人而言,社会保障的建立健全是其收入水平稳步提升的根本途径,而这又依赖于“蛋糕”做大,有赖于经济平稳快速增长、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只有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保证人民群众有长期稳定幸福感。(2)本文的研究显示,来源稳定的收入在老年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其相应的幸福感就越高,因此要提升老年人的福利水平,当务之急是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2009 年,我国开始推进“新农保”的工作,除部分地区近几年调高基础养老金额度外,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为每人每月最低为 55 元;2016 年,中央首次统一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由 55 元提高到 70 元,以此推算,全年将增加稳定收入 840 元,根据全样本调查数据计算,这会把东、中、西部农村老年人稳定收入所占的比重分别提高 2.5 和 10 个百分点,必将极大地提升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基础保障水平仍然偏低。本文研究表明,农村老年人从“不幸福”到“幸福”的转折点在 19200~27302 元阶层,年均增加 840 元的收入还不足以使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为了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幸福,应当提高养老金水平,多种渠道拓展养老基金的来源,如鼓励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寿险机构等的参与,时时根据实际状况不断优化资金状况,逐步提

高“新农保”的保障水平和力度。(3)鉴于我国城乡分割和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对收入和幸福感造成的影响,在把蛋糕做大的同时必须着力解决好“切蛋糕”的问题,要尽快改变城乡之间制度上的差异,加大对农业反哺力度和中央财政对农村地区及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合理均衡配置资源,提高不同地区老年人的幸福感。(4)除了收入等因素,应当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卫生医疗条件、精神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改善,全面有效地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使老年人有一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真正构建一个“老有所终”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陈彤:《西部地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分析》,《中华文化论坛》2009年第2期。
2. 官皓:《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绝对水平和相对地位》,《南开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
3. 胡洪曙、鲁元平:《收入不平等、健康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中国软科学》2012年第11期。
4. 胡宏伟、高敏、王剑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分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5. 何立新、潘春阳:《破解中国的“Easterlin悖论”:收入差距、机会不均等与居民幸福感》,《管理世界》2011年第8期。
6. 刘军强、熊谋林、苏阳:《经济增长时期的国民幸福感——基于CGSS数据的追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7. 鲁元平、张克中:《老有所乐吗?——基于退休与幸福感的实证分析》,《经济管理》2014年第8期。
8. 元寿伟、周少甫:《收入、健康与医疗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公共管理学报》2010年第7期。
9. 任杰、金志成、杨秋娟:《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元分析》,《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0年第1期。
10. 任海燕、傅红春:《有序概率模型的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和幸福感研究》,《求索》2012年第3期。
11. 谢识予、娄伶俐、朱弘鑫:《显性因子的效用中介、社会攀比和幸福悖论》,《世界经济文汇》2010年第4期。
12. 殷金朋、赵春玲、贾占标、倪志良:《社会保障支出、地区差异与居民幸福感》,《经济评论》2016年第3期。
13. 于天琪:《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基于吉林省老年人口的调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14. 朱建芳、杨晓兰:《中国转型期收入与幸福的实证研究》,《统计研究》2009年第4期。
15. Betsey, S., & Justin, W.,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Income: Is There Any Evidence of Sati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992, 2013.
16. Blanchflower, D., & Oswald, A.,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8, No. 7-8, 2004, pp. 1359-1386.
17. Clark, A., & Oswald, A., 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61, No. 3, 1996, pp. 359-381.
18. Clark, A. E., Etilé, F., Postel-Vinay, F., Senik, C., & Van der Straeten, K., Heterogeneity in Reported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Twelve European Countrie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5, No. 502, 2005, pp. 118-132.
19. Diener, E., Suh, E. M., Lucas, R. E., & Smith, H. L., Subjective Well-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25, No. 2, 1999, pp. 276-302.
20. Dolan, P., Peasgood, T., & White, M.,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Vol. 29, No. 1, 2007, pp. 94-122.
21. Easterlin, R. A., Feeding the Illusion of Growth and Happiness: A Reply to Hagerty and Veenhove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74, No. 3, 2005, pp. 429-443.
22. Easterlin, R. A.,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Economic Analysis: A Brief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45, No. 3, 2001, pp. 225-226.
23. Easterlin, R. A., Will Raising the Income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27, No. 1, 1995, pp. 35-47.
24. 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David, P. A., & Reder, M. W.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89-125.
25. Emmanouil, M., & Moro, M., The Poor, the Rich and the Happy: Exploring the Link between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Vol. 38, No. 1, 2009, pp. 147-158.

26. Frey, B. S., & Stutzer, A., Happines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0, No. 466, 2002a, pp. 918—938.
27. Frey, B. S., & Stutzer, A., *Happiness and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b.
28. Frijters, P., Haisken-DeNew, J. P., & Shields, M. A., Money Does Matter! Evidence from Increasing Real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East Germany Following Reunific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 No. 3, 2004, pp. 730—740.
29. Gokdemir, O., & Dumludag, 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Turkish and Moroccan Im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 The Role of Absolute and Relative Incom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106, No. 3, 2012, pp. 407—417.
30. Graham, C., & Felton, A.,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Insights from Latin America.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Vol. 4, No. 1, 2006, pp. 107—122.
31. Graham, C., & Pettinato, S., *Happiness and Hardship: Opportunity and Insecurity in New Market Economies*.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6.
32. Lelkes, O., Tasting Freedom: Happiness, Relig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59, No. 2, 2006, pp. 173—194.
33. McMahon, D. M., *Happiness: A Histor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34. Rojas, M., Heterogene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Happiness: A Conceptual-Referent-Theory Explan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Vol. 28, No. 1, 2007, pp. 1—14.
35. Senik, C., When Information Dominates Comparison: A Panel Data Analysis Using Russian Subjective Dat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88, 2004, pp. 2099—2123.
36. Shields, M. A., & Price, S. W., Explor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terminants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England.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Statistics in Society*, Vol. 168, No. 3, 2005, pp. 513—538.

## Income Threshold,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Happiness of the Aged

BAI Zhiyuan, QI Shouwei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430073)

**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survey data of 3970 the elderly with age over 55 from urban and rural in twelve provinc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income on the elderly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with urban-rural segmentation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come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SWB of the elderly living in urban and eastern, but not for the east regions; the impact of absolute income on well-being dose not only have direct effect, but also through indirect effects of health and recreation. The relative income had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SWB of the elderly but for urban areas.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levels of income, and the income change point from “unhappiness” to “happiness” of the elderly living in the rural and the Midwest regions is lower than the urban and eastern. Therefore,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older persons in China, the key points are that increasing income of the elderly, and improving the income guarantee level of the elderly in the rural areas and the Midwest region.

**Keywords:** Subjective Well-Being, Absolute income,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of the aged

**JEL:** J14, I30, I31

责任编辑:鲁 洲